

◎ 王妍 著

经学以前的
《诗经》

东方出版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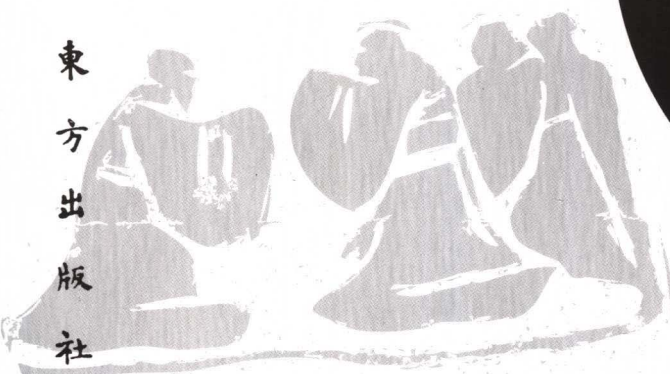
I207.22
132

2007

◎ 王妍 著

经学以前的
《诗经》

东方出版社



责任编辑:张伟珍

封面设计:肖 辉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经学以前的《诗经》/王妍著. -北京:东方出版社,2007.3

ISBN 978-7-5060-1994-1

I. 经… II. 王… III. 诗经-文学研究 IV. I207.2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7)第 021511 号

经学以前的《诗经》

JINGXUE YIQIAN DE SHIJING

王 妍 著

东方出版社 出版发行

(100706 北京朝阳门内大街 166 号)

北京新魏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2007 年 3 月第 1 版 2007 年 3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本:880 毫米×1230 毫米 1/32 印张:9.75

字数:234 千字

ISBN 978-7-5060-1994-1 定价:20.00 元

邮购地址 100706 北京朝阳门内大街 166 号

人民东方图书销售中心 电话 (010)65250042 65289539



作者简介 ●

王妍，1965年1月生，吉林怀德人。文学博士，硕士研究生导师。现任哈尔滨工业大学人文学院副教授。编著出版了《中华古典文赋精选详释》、《中华古典诗词曲精选详释》等，在《学习与探索》、《自然辩证法研究》等期刊上发表论文20余篇。

● 内容简介

本书作者力图以《诗经》为切入点，把经学作为一个历史的坐标，描述“诗三百”从诗学到经学的历史。作者在论述中把“诗三百”放置到整个诗歌发生的历史土壤上，把诗的历史与《诗》的历史结合起来，以诗论《诗》，从诗的起源追溯《诗》的起源，追溯到上古诗歌艺术发生发展的历史，描绘出“诗三百”的原始形态，勾勒出在礼乐文化土壤上产生的“诗三百”文化经典进而演化成政治意义的《诗经》的历史过程。

责任编辑：张伟珍

封面设计：肖 辉

序

经学的发生是中国文化史上的重要事件。虽然经学成熟于汉代，却有着漫长的发生和发展的历史。现代学者对经学的消极意义多有批判，但是应该看到经学的基础是文化经典，《易》、《诗》、《书》、《礼》、《春秋》等典籍是体现华夏民族精神意蕴的文化元典，聚集着中国古老的伦理道德、思想智慧和艺术精神。经学固然有对文化元典的种种曲解与误读，却依然难以掩盖文化经典自身的光芒。从根本上说，中国没有宗教，而民族精神却一脉相传历久弥新，文化经典在民族精神建构上的意义是不容忽视的。从这个意义上讲，经学在中华民族精神建设上至少有传承之功。

王妍的著作力图以《诗经》为切入点，把经学作为一个历史的坐标，描述“诗三百”从诗学到经学的历史。本书的重要意义是将诗的历史与《诗》的历史的结合起来，作者不是一般意义上论述《诗经》的编辑与流传，而是把“诗三百”放置到整个诗歌发生的历史土壤上，以诗论《诗》，从诗的起源追溯《诗》的起源，追溯到上古诗歌艺术的发生发展，使得整个论述有了较为宽阔的理论视野。初看上去，“经学以前的《诗经》”，这个题目似欠严谨，因为在经学以前并不存在《诗经》，而我理解作者只是沿用了历史上的习惯性称谓，作者的真正目的是拂去经学的历史烟尘，描绘出“诗三百”的原始形态，勾勒出在礼乐文化土壤上产生的“诗三百”文化经典进而演化成政治意义的《诗经》的历史过程。经典的意义是非凡的，所以《荀子·劝学》

云：“学恶乎始，恶乎终？曰：其数则始乎诵经，终乎读礼。”“六经”的称谓始见《庄子·天运》，所谓“丘治《诗》《书》《礼》《乐》《易》《春秋》六经”，《礼记·经解》也在经的旗帜下罗列了《诗》《书》《乐》《易》《礼》《春秋》的六部典籍，而这里的“经”是经典的，而非经学的。经典与经学的意义是有很大不同的，经典是文化的，经学是政治的，经典虽然也强调自身的重要意义，但并不排他；而经学往往是独断的，排他的。

诗的根本意义是立足于生存的，而不仅仅是一种技艺。海德格尔说，诗是人的本真存在，因此“歌声即生存”就成了海德格尔诗学的重要论断。意大利学者维柯在《新科学》中认为，原始的智慧是一种诗性的智慧，原始时代有着诗性的天文、诗性的地理、诗性的历史、诗性的科学……，诗性是早期人类的世界观，他们以诗意的目光打量世界，一切都充满了诗性的光彩。正因为如此，《诗经》一出世，就与社会生活紧密联系在一起。赋《诗》言志成为春秋时代独特的文化景观，在宗庙祭祀、外交往来、礼乐教化、乡党宴饮等重大的社会活动中，人们常常称诗喻志，一方面剖白心迹，表达思想，一方面也是盛大的礼乐活动，是艺术欣赏和审美熏陶，所以《左传》在记录吴季札观乐时总以“美哉”作为评论的引言。只是随着诗乐分离，战国以降，人们越来越偏重对“诗三百”的思想意义的阐发，而在“赋诗断章，余取所求”的前提下，称引者偏重于表达自己的意志而忽略了诗的本事本义。儒学在汉代由思想上的子学转为政治上的经学，《诗》的阐释也发生了重大的精神转向，成为体现政治意志的经典。虽然由于政治的力量，“诗三百”的地位大为增强了，但是它也由此失去了原初时期的鲜活与生动。这样看来，作者将题目定为“经学以前的《诗经》”是颇有意味的。

这部著作是在博士论文基础上完成的。王妍最初的专业是当代

文学,从当代转入古代,从当下的文学现象的批评转入上古时代的文学研究,我一度有些担心,她是否有足够的时间和精力完成这样的转换?而她攻读博士学位的一段时间里,丈夫远在京城读书,她一方面承担着繁重的学业,一方面又悉心照料年幼的女儿,同时她是教师,还需要完成必要的教学工作。甘苦自知,她付出了怎样的艰辛和努力,外人恐难知晓,我只知道布置的作业她总是第一个完成,论文草稿也是她第一个交给我,提出修改意见后,她又很快将改正过的论文交出来,让我感动的不仅是她的勤奋和认真,更有她对学术的真诚。岁月倏忽,白驹过隙,转眼间王妍已经毕业三年多了。由于不在一所学校,对她的近况了解得不多,但是看看她送来的论文修改稿,便知道她勤奋依旧,忙碌依旧,对学术的虔诚和真诚依旧。是为序。

傅道彬

2006年12月

目 录

序	(1)
引 言	(1)
第一章 诗的起源与《诗》的源起	(9)
一、诗的起源	(9)
1. 诗起源于人类的生存实践,发展于原始巫术 礼仪	(9)
2. 原始之诗传达人类的主观意志和生命体验	(14)
3. 原始之诗宣释和教化原始伦理	(18)
二、《诗》的源起	(22)
1. 诗与巫政垄断:颛项绝地天通的寓意	(22)
2. 诗与王权结合:周公制礼作乐的意义	(28)
第二章 《诗》的思想与周代礼乐政治	(33)
一、《诗》的思想与周代礼乐政治	(33)
二、西周末期前的《诗》及礼乐精神的宣教	(36)
1. 天命佑周、君命天授的“王权中心”思想	(36)
2. 天命靡常、聿修其德的“敬德”思想	(40)

3. 追祖颂功、法祖垂戒的“先祖圣化”思想	(46)
4. 康功田功、怀保小民的“农耕政道”思想	(52)
5. 宴燕合好、宗子维城的“君明臣贤”思想	(57)
三、西周末期以后的《诗》及礼乐精神的道德教化	(71)
1. 道德教诫与道德批判:礼仪规范的道德认同	(72)
2. 天命观的道德化倾移:作为普遍准则的道德	(80)
3. 《国风》及礼乐精神的普泛化	(88)
第三章 春秋赋《诗》与《诗》的经典化	(105)
一、春秋赋《诗》与礼乐制度	(106)
1. 春秋赋《诗》与赋《诗》概况	(106)
2. 春秋赋《诗》是礼乐教育的结果	(109)
3. 春秋赋《诗》是礼乐崩坏的表征	(114)
二、赋《诗》:以《诗》为元典的文化实践	(120)
1. 引《诗》以证理:《诗》作为德政标准的“义之府”	(120)
2. 称《诗》以喻志:《诗》作为言行准则的“礼之类”	(125)
三、赋《诗》的方法:对《诗》的经典化解读与接受	(131)
1. “断章取义”的方法	(131)
2. “诗以合意”、“歌诗必类”:赋、比、兴的经典化 解读与接受方式	(133)
第四章 儒家论《诗》与《诗》的儒学经典化	(141)
一、儒家引《诗》论《诗》的背景	(142)
1. 政治背景:制度的变迁	(142)

2. 文化背景:《诗》乐的分离·····	(144)
3. 思想背景:道术将为天下裂·····	(148)
二、孔子论《诗》:文化经典儒学化的转折·····	(151)
1. 《诗》之用:兴观群怨,事父事君·····	(154)
2. 《诗》之质:诗无隐志,乐无隐情·····	(165)
3. 《诗》之文:乐而不淫,哀而不伤·····	(170)
4. 《诗》之解读:“思无邪”和“诗可以兴”·····	(173)
三、儒家《诗》说的传承及《诗》的儒学经典化历程·····	(176)
1. 《诗》旨的阐发:由修身致用到“圣王之道”·····	(176)
2. 《诗》志的教化:从情志合一到“反情和志”·····	(184)
3. 《诗》教的品格:由“中和”到“温柔敦厚”·····	(190)
4. 《诗》释的视角:由用《诗》之义到《诗》之本义·····	(193)
第五章 汉代解《诗》与《诗》经学的确立·····	(207)
一、《诗经》成立的背景·····	(207)
二、从《诗》到经:四家诗的经学化阐释·····	(212)
1. 四家诗概述·····	(212)
2. 今文、古文:从《诗》到经的经学化阐释·····	(213)
三、《毛诗》:《诗经》体系建构的完成·····	(229)
1. 《毛诗》是先汉及汉代《诗》学的集成之作·····	(229)
2. 《毛诗》的经学体系·····	(232)
第六章 政教语境下的诗学品格·····	(258)
一、诗的本质:诗言志·····	(260)
1. 诗作为文体的体认·····	(260)

2. 诗的言志与抒情功能的体认	(263)
3. 诗言志:诗的政教宿命与人文关怀	(269)
二、诗的艺术方法:赋、比、兴	(272)
1. 《诗》是原始文化之诗的成熟形态	(272)
2. 教《诗》、用《诗》、解《诗》对赋、比、兴作为艺术 方法的启示	(281)
三、诗的美学特征:温柔敦厚	(288)
参考文献	(294)
后 记	(300)

引 言

《诗经》原本称作“《诗》”或“《诗三百》”。

孔子在《论语》里虽说“《诗》《书》执礼”，“不学《诗》无以言”，“诵《诗》三百，使于四方……”但并没有说《诗》为经；孟子也屡说《诗》、《书》、《春秋》，也未曾说《诗》为经。在战国时代，“经”可以指百家之言，《国语》里有“挟经秉枹”之说，韦昭注：“经，兵书也”。墨子的书有“经”、“经说”，《庄子·天下》：“苦获、己齿、邓陵子之属，俱诵《墨经》。”《管子》前九篇名“经言”，《韩非子·内储说》叙述七术的大要为“经”，其次为“经说”和“记”。可见“经”在最初并非仅指儒家的学说著作。

与孟子差不多同时代的庄子似乎是第一个把《诗》称为“经”的。《庄子·天运》篇：孔子谓老聃曰：“丘治《诗》《书》《礼》《乐》《易》《春秋》六经，自以为久矣，孰知其故矣。”又《天下》云：“《诗》以道志，《书》以道事，《礼》以道行，《乐》以道和，《易》以道阴阳，《春秋》以道名分。”然而目前学界已经趋于认定，《庄子》中《天运》、《天下》篇晚出，且有后人注释窜入的可能，因此这个材料姑且存疑。目前从文献来看，最早把儒书称为“经”的是荀子。《荀子·劝学》篇云：“学恶乎始？恶乎终？曰：其数则始乎诵经，终乎读礼。”其前后并举《书》《诗》《乐》《春秋》。首次把《诗》称为儒家的“经”。战国末期出现的《礼记·经解》说：“孔子曰：入其国，其教可知也。其为人也，

温柔敦厚，《诗》教也；疏通知远，《书》教也；广博易良，《乐》教也；絮静精微，《易》教也。恭俭庄敬，《礼》教也；属辞比事，《春秋》教也。”这里虽然没有在每种之后加上“经”字，而作者把这些典籍一并列入《经解》之中，实已称之为“经”。《礼记·经解》中有一些文字出于荀子《礼论》，学界认为此为荀子后学所为。

《诗三百》何时被改称为《诗经》，由于战国战乱频仍，古籍散佚，实难稽考。目前所能考知最早题名为《诗经》的，应是司马迁《史记·儒林传》所说的“申公独以《诗经》为训以教”，但司马迁在《史记》的其他地方，还是按照通常习惯称为《诗》。西汉初年，文、景时期，《诗》就已立为博士之一，而到了汉武帝时，与《书》《礼》《易》《春秋》并立为五经博士，自此以后，《诗》或《诗三百》则日渐被《诗经》这个名称所代替。

《诗》之为《诗经》并不是偶然的。与世界上许多文明的经典一样，由《诗》及对《诗》的诠释一起构成了《诗经》学现象。由《诗》到经的道路，自有其历史的必然性，这是上古时代中国人对传统文化精神的创造和选择，并非仅是统治阶级所能一意扶持和树立起来的。“权威并不依赖教条的力量，而是依靠教条的接受生存……真正的权威所具有的遵从既不是盲目的也不是奴性的服从。”^①由于《诗》在产生之初的合理性和其后诠释的合规律性，人们自然相信《诗》作为“经”的正确性和权威性，并自觉地崇奉它，因为《诗》的精神体现华夏民族社会共同体的道德观和价值。尊《诗》为经，在于它能适应社会，规范社会。随着社会的发展，《诗》作为经典，其思想内容必然会在不同的时代背景下被有意加以变通和调整。由《诗》到经的发展是以不断地对《诗》原典进行重新诠释的形式开展的。在走向经

^① 伽达默尔：《哲学解释学》，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94年版，第3页。

学的道路上,周公及周室之史、孔子和孔门诸子直至孟子、荀子及其弟子、汉代儒家学者都以他们各自的方式和姿态参与了对《诗》的创造性的诠释,对《诗》向经学的发展作出过不同程度的建树。“这种诠释表现为诠释者对传统的直接参与,从而构成悠久传统的一个环链。诠释并不是一种复现的过程,而是一种创造的过程。”^①“经典诠释活动常常反映出人们在新与旧之间、活的与死的之间进行选择的制度焦虑与人生焦虑。一部经典诠释的历史,即反映一社会共同体文化思想新陈代谢的历史。”^②由《诗》到经就是这样一部顺应时代需要而完成的思想发展的历史。

《诗》在汉代成熟为一门经学,它产生的基础却是汉以前的层层累积起来的对于《诗》的阐释。回望这个漫长的历程,《诗》是以怎样的过程从诗走向了经学?通常认为,经学是在先秦儒学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清人皮锡瑞主张:“经学开辟时代,断自孔子删定《六经》为始。”(《经学历史》)然而,先秦儒学的基础是什么?清人章学诚说:“周公成文武之德,适当帝全王备,殷因夏监,至于无可复加之际……斯乃所谓集大成者也。”(《文史通义》卷二《原道》上),则把《诗经》学的发端上推到周公。徐复观先生也以其敏锐的洞见指出,周公及周室之史是诗经学的关键性人物,周公及周室之史所作所编的《诗》、《书》,都含有教诫的意义,为了教诫的目的,在编纂中做了很大的选择。周公及周室之史可以说是发经学史的“先河”^③。袁长江的《先秦两汉诗经研究论稿》也将《诗经》研究的历史上溯到周代

① 姜广辉:《儒家经学思潮的演变轨迹与诠释学导向》,《中国哲学》第22辑,辽宁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

② 同上。

③ 《徐复观论经学史二种》中,第一部分《中国经学史的基础》,上海,上海书店2002年版,第8页。

的太师,认为他们既是《诗》的采编者,也是《诗》的传授者,他们对《诗》的作为是《诗经》学的发端。^①把《诗经》学的发端定于孔子或周公显然在《诗经》学上还只是一个“推论”。^②仅从《国语》、《周礼》中几条文献记载中推论出这样的结论,的确使推论者也感到有些苍白。

基于此,探索诗由《诗》到经的道路,尚需将目光投向诗歌发展历史的更深处。经学的基础是先秦的儒学;而先秦的儒学是对三代文明的思考和总结;三代文明是上古文明的产物。因此在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之上,可从以下几个方面进一步疏理和探讨从《诗》到经的必然性:

一、《诗》成为周代礼乐制度组成部分的历史渊源;《诗》的源起与诗的起源的必然联系。二、作为礼乐制度的组成部分和宣传工具,《诗》本身所宣教的礼乐精神对《诗》走向经学的内在规定性。三、春秋时代《诗》的流传应用铸成的《诗》文本的经典意义。四、孔子将礼乐精神提炼为儒家哲学体系,其弟子及再传弟子传承并阐释和发挥孔子思想,而孔门诗教又影响了汉代的经学。五、在汉代政治和思想的背景下,经学家对汉以前诗说的选择、继承和阐释,建构了汉代《诗经》学的体系。

然而,同时不该忘记的是,《诗经》本身是客观实在的文学作品。在政教和经学语境中,“诗”的文学观如何发生、发展和延续下来,诗学与经学的关系,是非常耐人寻味而又富有重大学术意义的课题。

^① 参见袁长江:《先秦两汉诗经学论稿·壹—诗经发生学论》,北京,学苑出版社1999年版。

^② 同上。

《诗经》绝不仅仅只是经学,《诗经》是文学的客观存在,是中国文学的源头。由《诗经》开始的“风雅”、“比兴”一直是中国文学的精神传统。后来的《楚辞》、汉赋、唐诗、宋词、元曲等等,无不追步《诗经》的遗风。魏晋以后,著名的文论家刘勰、钟嵘开始从文学的角度高度评价《诗经》的辉煌成就。《诗经》的文学研究虽然从刘勰时代才开其端绪,但此前在《诗》经学阐释的话语语境之中,思想家们也开始了对于《诗经》的文学本质的探索。应该说,关于诗的批评,是周代乐官们汇编成《诗》之后出现的。从周朝乐师开始着手编辑《诗》的时候,就已经涉及了《诗》的艺术特性,就已从诗乐中体会到诗与人的情志的关系,在以“中、和、祗、庸、孝、友”为乐德教国子的同时,也教授诗以“兴、导、讽、诵、言、语”(《周礼·大司乐》)等等方法,以赋政专对之用。而孔子是中国历史上研究《诗经》的第一人,他所说的“诗无隐志,乐无隐情”、“思无邪”、“兴、观、群、怨”既是经学的发端,又是文学研究的发端。继之而后起的孟子、荀子,以及汉儒无不在经学诠释的同时,也探讨了诗学的本质和方法。中国诗歌发生的时间、原因,以及诗歌发生的心理过程和历史过程都在经学研究的同时被予以极大的关注。他们所提出的见解,规定和影响了诗学的研究道路和研究领域。这些事实说明历史上在进行经学研究的同时,思想家、经学家们为经学研究的目的总结了诗学的经验,这些观念散落在经学诠释体系里,但也为诗学的发展筚路蓝缕,开辟了道路。

因此可以说,《诗》一方面走向经学,同时一方面也在走向诗学。而诗经学规定和制约着诗学的发展。

由此,本书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之上,疏理和描述经学以前的《诗》是如何从《诗》到经的历史过程,以诗的起源与《诗》的源起为背景,探讨《诗》所反映的礼乐精神对经学化道路的内在规定性,描述《诗》的经学的萌芽、发展、充实、完善的历程,描述各个时期思想